清规还是国法: 1946 年北京白云观 住持安世霖火烧案再研究

付海晏

摘要 1946 年 11 月白云观住持安世霖、督管白全一被观内 36 名道士以清规名义焚死,这一惨案,毫不意外地成为北平乃至近代道教史上的重大社会新闻。反对者以清规名义处理安、白二人,实际上是长期以来白云观宫观内部矛盾冲突的结果,当反对者最早以清规、以司法诉讼、向社会局控诉等次第失败后,最后重新选择被安世霖废弃的传统清规条款处死安、白二人。尽管部分社会舆论怀疑此条清规的存在,尽管辩护律师强调焚烧老道案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也是宗教问题,强调道士行动的合理性,然而北平地方法院的判决尽管考虑到自首等情节,却否定了清规焚烧住持等合理性。

关键词 白云观;清规;国法;安世霖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6)03-0145-07

DOI: 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6.03.021

作者简介 付海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武汉 430079

2008 年,当笔者完成《安世霖的悲剧:1946 年北京白云观住持安世霖火烧案的法律社会史研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2 辑)一文时,尽管当时已经有心、且初步涉及案件审理问题,可惜由于资料、篇幅等限制,未能深入阐释,尤其是对当事人在言论中频频提及的国法、清规的关系,只能点到为止。在进一步发掘新史料的基础上,本文拟重点探讨安世霖火烧案后法律审判中时人对于清规、国法的讨论,不仅希望能推动学术界对这一惨案的认识,并由此个案窥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宗教与法律关系。^①

一、从国法到清规:安世霖惨案

1940 年代以来,白云观住持安世霖成为宫观内部矛盾的焦点,面临着来自宫观内外的反对者。安世霖,字泽普,河北房山县黑龙关人,民国十三年投入白云观受戒学经。有史料曾指出“安道自

幼好静,寡言语,颇为陈道所器重,当委以监院职,未几陈道羽化,安即升任为方丈”。可是,正如了解白云观内情的近代著名画家徐燕孙所云,在 1924 年以前,白云观可谓仍处于黄金时代,“交结显要,亦自煊赫一时”。可是由于“老辈凋零,庙运随国家社会,已趋江河日下”,“在当时欲觅一适当人选,主持观事,已属不易”。^②安世霖就任住持之后,“颇为同派道友所不满,同时因争夺庙产,互相倾轧,灵同伐异,诉讼多年。虽经河北高院审判,亦未得圆满解决。”^③白云观知客朱宗玉等人曾将安世霖剪去头发,试图拉座,结果失败,“经官方将行凶主犯捕获,依法惩处并驱出庙外,自此双方结仇日深。”特别是由于安世霖盗卖庙产被司法控诉时,尽管被日伪法庭判决有罪,但是实际上并未入监狱。随着山东祁县道士许信鹤、山西大同道士马智善的到来,反对者的力量得到加强。特别北平光复后,反对者由道众陈自忠等

出名,拟具呈文,分呈行营、蒙难同愿会、警备司令部等各机关控告,并向冀高法院检举安道有汉奸嫌疑,除军事机关批示,设法调查惩办,而法院监察处认为证据不足,“竟将安道予以不起诉处分,了结此案。从此安道逍遥法外,更无忌惮。”也正是如此,许信鹤及马志德为首,召集道士暗中计议,“安白既手眼通天,依法不能解决,不如按照清规依法处置,以除道家之螫,众人亦均同意。但安白二人正恋女色,常不在观众留宿,故道众未能乘机下手。”正如报刊所记载,尽管安世霖也意识到危险的来临并曾作了防备,“时安某亦略闻道众将对其不利,因而将他的住家在第五层玉皇殿东小跨院中,后通空院,将北墙下盘成一门仅除一砖之砖,倘遭不测,则破墙奔逃,外挂一布帘,并道衣等物,以遮人耳目。白住东耳房道北监院室。”可是为时已晚。

1946年11月14日,北平《华北日报》第三版刊登了一条极为轰动的消息:在“白云观火焚二道士”,还有两小标题极为醒目:“道众私自恶行惨杀住持,昨日验尸法院将有措置”。报道内容介绍称“本市白云观十一日夜十二时发生道众火焚主持安世霖、执事白全一惨案。”^④事实上,由于此案之离奇,第一次欧战纪念日之夕,平郊白云观火烧安白一案的新闻,风传遍了全国。采录世界重要消息不落人后的美国《时代周刊》,十一月二十五日也登载了一段消息。^⑤

由于事变后参与谋杀的道众曾向各报刊、机关发布冤启,对于事变前的矛盾冲突,各报刊大体不差,然而火烧的具体事情经过到底如何?根据北京档案馆所藏北平市警察局郊四分局的报告,案发经过简单介绍如下:

白云观下院西便门内关帝庙充道士许信鹤等人在抗战胜利前后多次控告白云观住持安世霖督管白全一在敌伪时期勾结日寇,引地寅治,即残害道友盗卖庙产,与女人姘度等事。十一月十一日探知安白二人住于观内,于深夜乘其二人睡熟,率人捉拿住二人,在二人身上倒上煤油,搬来柴火,将二人活活烧死。在烧死安、白二人后,根据报告可知,许信鹤等人主动致电附近派出所。十二日八时十五分,第二派出所警长舒吉秀接白云观许

信鹤的电话,后者称由于本观住持安世霖、督管白全一违反清规,已于“于夜内依清规用火烧死,请为查验”。舒姓警长听闻后马上电报分局当派员警驰往白云观庙内。许信鹤马至善承认烧死安白二道士“系彼等主谋,故行报案愿代表到案”,警察在四御殿前查验到“有被火烧毙尸体两具,遍身焦烂,面目不清,殿墙上有榜示一纸,上书安白不守清规之犯行”。而所列36人名单中,“有十八人现在观内,有十八人外出念经”。除了将许信鹤等18人解案外,“外出念经之十八人经派警分别查传,十七人到案,尚有一人名田恒意未着”;对于庙产之看观,警察令“由负责之道士袁明理、薛至杰二人会同现场官警将重要房舍方丈堂监院堂库房督管室讲师室西客堂等处以临时之封条,暂行封闭,计用临时封条一号至十号,其余未封之室均不重要”。

根据档案,我们发现,在致电派出所的同时,白云观三十六名道众联合呈文北平市警察局,许信鹤等人报称白云观为执行《太上清规》已经将安世霖、白全一二人架火焚烧。^⑥到13日,地方检察处检察官也展开了验尸等行动。为何要烧死安世霖等人呢?许信鹤等人供称因法律无法解决,故“起意以清规除奸”,以太上家法处置。安、白二人所犯之罪,许信鹤等人亦发布榜文予以公示。^⑦从该榜文具体内容可以发现,许信鹤等道众认为安世霖、白全一盗卖庙产、盗卖长生猪马羊、勾结当局迫害道众、擅改清规等,不仅违法清规,更是干犯国法。由于在抗战胜利后,张教全等道众以汉奸案先后呈文北平行辕、第十一战区盟难同志会、宪兵十九团警备司令部、监察使署、河北高等法院等部门,然安世霖均未被查办。总结以法律解决“屡打屡败”的原因,以许信鹤为代表的道众认为,无权无势的穷道人和势大钱多的安世霖打官司是永远打不过的,只有用直接行动来解决才是惟一有效的办法。^⑧正如常人春的研究所提及者,许信鹤等人于事前曾三次谋划行动。在谋划的过程中,有道众曾四处寻找门路,以便有更好的办法,经过吕祖祠李道长联系,国民党某机关要人答应暂时扣押安世霖,白云观立即选举新任持取而代之,但是须以100条黄金为酬劳。如此,

许信鹤之师兄杜信灵^⑨提议若真心卫道,则按许信鹤的提议以教规办事。而所谓之教规,就是最后火焚。

二、火焚为清规?

安世霖被烧死后,基于榜文、众道士的呈文,整个舆论事实上对于安世霖多有较为负面的评价。徐雁孙以“鄙人与白云观有四世之交谊(安道除外)”的身份提到曾亲见白云观藏有六十花甲子像,“侧闻此画已零幅分别售出,将来法院调查安道生前罪行,此事并为关键。画之存在与否,即足证明其一部分罪行之有无也”。^⑩

然而由于反对者采用火焚之方式,特别是当案发情节经各报传开后,对于外人而言无疑是巨大的震惊。不少人在疑问究竟是否有火焚之清规。著名剧作家景孤血曾作《连天谣·烧老道》介绍此案,感叹太上国法好厉害^⑪。对于安、白二人被杀死的方式,即便是对白云观较为了解的北平当地人士,也多有不解。针对前节榜文中提到的所谓太上法规第一条犯奸淫窃取,即处以焚身之罪,有人曾提出“是否确有其事?”。在安世霖被烧死后,写出长篇《八十代来之白云观》略史的“穷老道”对此也似乎一无所知:惟独老道,以修真养性,清静无为为主;而竟由缠讼而剪发髻,以至于揉眼、勒脖、棍打、火烧、在四御殿前供献煤油烤人肉,翻遍了老子道德经及南华经,以至全部道藏,这个“太上家法”,不知载在哪部经内?宗教是辅助法律之不足,而三清弟子本身,竟演出如此惨酷悲剧,能辅助法律不能,那是另一问题。^⑫

虽然没有更多的资料考证出“穷老道”的真实身份,但是通过他的长篇论述,可以发现他对从高仁峒、陈明霖、安世霖这白云观三代方丈的历史极为了解,对于三人的特点,他的评价也极为传神。在这篇文章中,穷老道肯定了安世霖面临着乱世处境艰困的不易,他也指出尽管安世霖才有余然道德涵养不足,不能与道众同甘共苦,一人专政。安世霖的专政,穷老道指出体现在其在白云观人事组织、挂单的升迁程序中的大权。在人事方面安世霖以监院兼住持,身份重要“仿佛新制之国务总理代行总统职权,又仿佛以重臣而摄政

者”^⑬。对于挂单的升迁程序,安世霖通过改革强调道士之升转不按年限,以个人成绩而论,均有其制定提升,“安世霖之得罪人,此种升降之权,亦为原因之一”。对于挂单之管理,安世霖新定《云水去留条例》、《十方云水堂细则》严格对挂单道士对管理,对不遵堂主指导而犯规者则“催单”,“被方丈监院撵出,三年后始准再来挂单,若犯大规则革之,永不准来矣,此规则亦为安世霖所定,招人恨怨,以此最甚。”

穷老道的描述进一步证实了笔者此前的结论,即安世霖作为近代宫观制度改革者的悲剧性角色,这种改革加强了安世霖在全真宫观中的权力,更基于其本身的不完美,导致其成为宫观矛盾的焦点。或许是为了更进一步革新旧的宫观制度,安世霖重新修订了白云观的全真清规,穷老道注意到清规的种类,但是对于焚烧安世霖的“太上家法”,穷老道称在道律中无此惨酷,寻遍道藏也不知为何物。

通过上述所引文字,可以发现“穷老道”注意到安世霖重新编撰《白云观全真道教组织纲目》,通过对挂单程序以及升迁由住持制定的描述,可以推测穷老道肯定明了安世霖对白云观的宫观改革,然而考察他对清规内容的描述,可以发现他所了解的清规只是安世霖新定的内容。笔者在此前专论安世霖的宫观改革中曾指出安世霖曾重订《白云观全真道教清规玄范》共32条。^⑭从这些完整的内容来看,的确没有火焚的内容,然而安世霖所定清规没有相关内容并不代表白云观或其他宫观的清规就没有。

笔者曾经比较过安世霖清规与咸丰六年清规榜的差异,与旧规相比,安世霖的清规强调了对官方的依赖。如在旧版中偷盗常住以及他人财物只是被逐出,新版中,安世霖重视官方与国法在宫观治理中的力量,对于盗窃经典公物者,集众扰乱本观者、假道惑人骗财者、假冒本观募缘者直接送究,也就是交官方处分,与旧规相比,这是非常明显的变化。对于那些不慎火烛者、妄谈国政者、干犯法者,安世霖的处分则是更为严重——“杖革送究”。

安世霖的改革清规不仅仅是补充了新的内

容,更为重要的是还删除了就清规中的最终处罚,那就是“违犯国法,奸盗邪淫,坏教败宗,顶清规,火化示众。”也正是通过这一细节,我们可以猜测“穷老道”必定只是一个宫观外人,因为如果他是白云观道士或普通宫观道士,很难不会知道全真宫观有此规定。^⑮事实上,火焚并不是白云观独有的清规。类似的规定在沈阳太清宫伪满康德年间所定的清规中出现,该清规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凡奸盗邪淫,败太上法律,坏列祖之宗风,架火焚身。”^⑯

三、清规制裁还是国法制裁?

在上述榜文中,关于安世霖干犯奸盗邪淫等各指责,为事实以及此前社会局调查所承认。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许信鹤等人以清规解决是否合适?许信鹤等举事道众认为,以清规乃是法律无法解决后的无奈之举。正是如此,有资料显示在庭审中,许信鹤身穿崭新青棉道袍,足踏云履,俨然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而其他道士在退庭时窃窃发笑,意颇自得。^⑰

举事道众自视焚烧安、白二人为护道义举,北平道教界态度如何?在白云观惨案后,根据北平市政府的指令,北平道界在和平门吕祖阁成立“道教整理委员会”。1946年11月17日,该会负责人广福观住持孟广慧对报界发表谈话,表明道界之立场。孟氏强调清规不可等同于国法,且道众无权处置,认为凶犯应受国法制裁。^⑱孟广慧称安世霖、白全一触犯清规应令其停职,而道众不能擅自进行火化。尤其是许信鹤正在与安世霖等人诉讼,且其并非白云观挂单道士,更不应该介入此事。^⑲《申报》也曾报道过对待孟氏之态度“如果住持与香伙有犯清规,可予开革,主犯前曾对住持与香伙提出诉讼,结果败诉,此次谋杀,或系私人泄愤云。”^⑳

官方态度如何呢,某法界要人同日亦在报刊发表谈话,对于道众所称之为《太上清规》,该要人认为早应当纠正道众以清规等同国法的观念,对于道众所公布之安、白所犯各款,若以刑法而论,仅能判处徒刑四、五年,但结果竟被烧死,道众不仅无权处分且处分过重。关于处分道众,则认为

虽然可以依据自首情形减刑,但是仍然应“量刑惩处”。对于惨案发生原因,该要人称乃是由于管理机关对白云观监管不严所致。其称安世霖在1940-1941年间被控诉,并经过华北当局法院判处徒刑,但是安世霖适逢大赦,故并非法院不理其事。尽管如此,安世霖既被控告,即应更换住持,如此不至于发生惨案。^㉑

社会大众又是如何看待清规与法律的冲突?有采真者也曾刊文,在叙述道士架火焚烧安、白二人经过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北平道教整理委员会以及法界要人均否定道众以清规火化安、白二人的观点不同,署名采真者认为焚烧安世霖不仅仅是个重大社会新闻,在法律上也系一个极重要的复杂问题。照普通常识讲,安白两人犯了罪,自有国法惩办他们,观中道士擅自将他们焚死,当然成立杀人罪,“不过这是关于法律原则上的话,至于依照刑法,究应怎样判定罪刑,那就很不简单了”。采真提出“白云观中的道众原是道教中的人物,所以我们对于本案的论断,第一步须要在法律的立场上,再就宗教的角度去观察。”首先要弄清三个重要问题:(一)所谓太上法规第一条犯奸淫窃取,即处以焚身之罪,是否确有其事?(二)道众焚死安白两人,除激于义愤外,是否尚有其他原因?(三)黄榜上所揭示的各条罪状,是否确实?

采真指出关于第一点,“并非国法上可以承认太上法规第一条;但若道教的清规,确有这种成例的流传,那末由于教徒信仰上的狂热而触犯法律,其罪恶的性质,自与普通杀人罪有异,处刑时应从未减”。关于第二点,那些道众如果别无他种犯罪原因,其动机完全出于义愤,那就情节轻微得多,在判决时应当注意减刑。至于第三点,如果安白两人所犯的勾结日寇,荒淫害命等罪状,一切不虚;那末,就可证实三十六个道士的犯罪动机,“确系受了义愤的激动,否则,便是虚构事实,企图诿卸罪责了。”

对于本案犯罪的行为,由于“有黄榜为凭”,说明“商诸大众,公议火化”,本系不争之事实,所应审理的应该是道众犯罪之动机。如果确有清规、确系处于义愤、安白确系有罪,“那就可以援

引刑法第五十七条 第五十九条,而就第二百七十一条减轻其刑了”。至于白云观道众所呈递的自首状,采真提出那是不合法的:因为自首限于“案未发觉,”这就是说原在无人知有罪案时或不知被告是谁时,方可自首。像白云观道士焚杀安、白两人,差不多是公开的,无所谓“案未发觉”,当然也不生自首的效力了。^②

那么焚烧道士案,法庭又是如何处理呢?由于案情极为明了,11月19日,北平地方法院检察官王金岳很快提出了起诉。起诉书称许信鹤与马至善,借整理清规为名,“于本年旧历九月三十日,在西便门内关帝庙预定阴谋,意图烧死白云观住持安世霖、督管白全一二人”,在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上下午,又在关帝庙先后召集同道张教全、陈志中、李至慧、陈金明、杜信灵及在逃田恒义等八人,计议妥当,密约白云观道士薛至杰等共计三十六人,于是日夜实施将安、白二人杀害,起诉书称许信鹤等18人“均有刑法第二十八条、第五十六条、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项之嫌犯,其余各被告,均有上项帮助之嫌犯,并均应依同法第六十二条减轻处断。”^③“起诉书否定了道士们的整理清规之说,认为三十六道士均为杀人嫌犯。但是在律师看来却不是简单的杀人案。当此案开庭审时,义务帮助许信鹤辩护的律师凌昌炎发表了极为生动的辩护书,强调“关于犯罪部分本案为宗教革命,乃社会问题,并非普通杀人罪”。凌氏强调被告许信鹤、马至善二人首倡奉行“太上清规”,惩戒道教叛徒安世霖、白全一二人,“重整道教道德运动,事前并无组织,只知为正义,为清规,为道教,根源在于安白私自行为第一犯淫戒,姘女人。至于为何不依靠国法,凌氏云道士们自幼即为道士,并未受过国民教育,平时只知念典、修行、耳濡目染,除道教教规外,并无其他知识。在道士们他们应当遵守之法律,即为其道教共同遵奉之“太上清规”。“因为历来道教,对于太上清规,认为吕纯阳手订之唯一法典,事无大小,俱以清规为戒律,且国民政府亦无取消或禁止“太上清规”之法令”,自是承认该清规有存在之必要与效用。总的来说,律师的太多认为本案火烧老道案“完全为宗教革命,是乃社会问题,绝不能科以普通杀

人罪,应请依照刑法第十六条后半段,暨同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之规定,对于为首之被告,减轻其刑,或宣告缓刑。其余之被告,请依照刑法第三十条之规定,论知无罪”^④。

12月14日,北平地方法院做出的判决书,没有与辩护律师辩驳杀人案究竟是否属于宗教革命,以清规杀人与普通杀人罪的不同,针对辩护律师所云反对者与安世霖并无私人恩怨,判决书强调许氏等人有杀人动机,原因就是许信鹤等人因对于安世霖与白全一之观务处理及日常行为有所不满,并认为安、白二人“属唇齿相依,而怀恨安世霖、白全一之心日积,继探悉观内道士不满安世霖、白全一,遂萌杀机”,所谓整理清规只是籍口。辩论律师强调道士们具有自首情节,且正犯从犯应有所不同,从北平地方法院最后的判决来看,确实有所改变。最后判决许信鹤、马至善、杜信龄三人犯有“共同杀人”,各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其他参与人根据情节各判决不同刑期。袁明理等十余人虽然签名,但是不过为事后同意,不涉及杀人行为均判无罪。^⑤对此判决,许信鹤等为首三人并不服从,在律师帮助下,他们提出上诉。以事实与法律条文提出原判量刑过重,最终在他们的据理力争下,1947年9月21日,河北高等法院改判主犯许信鹤等三人服刑五年,其余十二人亦减刑或释放。^⑥北平解放前,许信鹤等被通知找到保人,刑期未滿者即可保外,但是由于无钱行贿,虽然找到保人也不见释放,直到新中国建立后,许信鹤等人才出狱,重新回到白云观下院关帝庙做道士。^⑦

安世霖被焚烧案件的发生,从反对者的视角而言,显然是从清规处理无果寻求政府监管、司法诉讼无果,最后回到传统清规焚烧的结果。早在1940年反对者以清规强行拉座失败后,道士的支持者就一份申请书中就曾指出宗教与法律皆为维持社会秩序之手段,宗教治人行为之动机,法律者乃治人行为之结果。在1940年安世霖将反对者朱宗玉等人开革出去后,反对者提出既然安世霖在宗教上不遵从裁判,其难免也不服从法律制裁,更难免借口法律以为掩饰,因此不如以行政力量作适当之处置,可免无限之波折。^⑧然而,长达多

年的司法诉讼,无论是日伪法庭对安世霖盗卖庙产的审理,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安世霖汉奸、破坏清规的审理结果,对许信鹤等人而言无不视为对安世霖等庇护,当他们失去对民国法律、社会局监管、民国政治丧失信心时,安世霖、白全一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以往对宫观寺院清规戒律的研究多注意它们与国法的协调、配合、补充,火焚案的发生提醒宫观、民众、管理者注意到清规与国法存在冲突与挑战的可能。安世霖重订清规从国家管理、宫观改革角度而言,显示安氏确为有才的一面。然而反对者所指出的安氏的诸多罪行,无疑弱化了他作为改革者的光彩。在惨案发生后,尚未审判前,一位与白云观略有关系的小丘八给《一四七画报》投稿,在痛斥北平地方的种种恶俗,关于白云观火烧安白这一段公案,他称这是社会的问题,“国家是保持四维还是保持奸淫邪盗呢?由他们随意判决去”。^⑨当一审案件判决前,《申报》曾评价到“静安寺之争庙产,白云观之烧道长,一切的宗教落入下乘!”^⑩无论如何,惨案的发生沉重地打击了白云观,正如不少画报等民国后期报刊所揭示的那样,白云观日渐荒凉,到次年顺星日,与游观的热闹相对的,安世霖惨案的阴影仍然没有被遗忘,所被查封的房间,观内的道士们也不时引起游人的窥视:

火烧老道案,尚未被人遗忘,若干贴着白纸封条的屋子,往往有人凑过去,在破纸的窗洞上看两眼,遇见道士也都要注意一下,总疑惑他是不是“三十六天罡”之一。尤其庙门前和殿堂上,全贴着皇皇的告白,上写“进香诸君,凡与安士霖白全一二道士有交谊者,请到本观后院东客堂北间,签留姓名住址,以便届时通知参加公祭为盼。公祭白云观安监院白督管筹备会公启”。倒有人为二位老道筹备公祭了!^⑪

到1948年时,由于国共内战,此时白云观也成为难民收容所,有记者介绍白云观“自火烧老道大案后,更面目全非,指作‘收容’,尚不失为废物利用。”^⑫从此前的热闹到荒凉,尽管有时局、世变等客观原因,然而也是内部剧烈冲突使然,不免令人感慨万分。

注:

- ①李养正曾说清规是对违反戒律、规矩的常住道士的惩罚条例,虽然各宫观自行依据道范而订立,白云观所定清规,在措辞、条款、轻重常有不同,但原则基本依据戒律。李养正《新编白云观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330页。
- ②徐燕孙《霜红楼谈屑:白云观补谈》,《一四七画报》1946年第8卷第8期。
- ③《烧死两道士(安世霖白全一奸淫犯清规,三十六个道士行凶后自首)》,《联合画报》1946年第193-194期。
- ④《白云观火焚道士》,《华北日报》1946年11月14日。
- ⑤玉和译《三十六友火烧老道轰遍全美“狗日里的死”:美国时代周刊上边对白云观事的记载》,《一四七画报》1946年第8卷第9期,第3页。Death in the Dog Days. Time. 11/25/1946, Vol. 48 Issue 22, p. 34 p. 1.
- ⑥《白云观为白全一违反清规盗卖物古玩并利敌杀害同道实难容留呈准备案》,1946年11月13日,J181-24-2162,第5-12页。
- ⑦《为白云观住持安世霖督管白全一被许信鹤等谋杀一案呈请鉴核由》,J181-24-2162,1946年11月16日。
- ⑧⑦许英华《北京道士火烧白云观安世霖、白全一亲历记》,第161、165-166页。
- ⑨山西文水人,时年40岁。案发后记者据庭审言论认为杜氏见识比其它道士高。参见常人春《白云观活烧老道案始末》,第218页。小柳司气太曾记载,杜曾任白云观四名知客之一(时安世霖排名第一),第117页。
- ⑩徐燕孙《白云观补谈》,《一四七画报》1946年第8卷第8期。徐氏在文章中也提到安世霖曾发现观中有唐代老子像:“白云观在唐代为天长观,唐以老子为始祖,尊为玄元皇帝,敕天下道院,立像奉祠,像有定型,颁自中朝,观中存有石像一躯,即为唐代敕造之物,于历史文物,在在锯有关系。本为安道于观中发现者,于此不为无功也”。
- ⑪孤血《连天谣·烧老道》,《一四七画报》1946年第8卷第5期。
- ⑫《八十年来之白云观·引言》,《一四七画报》1946年第8卷第2期。
- ⑬《八十年来之白云观:白云观人事的组织》,《一四七画报》1946年第8卷第4期。
- ⑭安世霖编《白云观全真道教清规玄范》,白云观自刊,1940年版,第5-6页。
- ⑮比咸丰六年清规榜较早的《京都白云观(全真清规)原本》第一条就是火焚的规定“凡奸盗邪淫,败太上之律法,坏列祖之宗风者,架火焚身”。李养正编《新编白云观志》,第330页。
- ⑯转引自闵智亭《道教仪范》,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在葛月潭羽化前后访问太清宫的五十岚贤隆曾记载了13条清规。他提到总共有31条清规,在五十岚贤隆的记载中,第三

- 条略有不同: 扰乱清规不遵法律者杖责革出。参见五十岚贤隆《道教丛林沈阳太清宫志》,第184—185页。
- ⑰⑱⑲⑳常人春《白云观活烧老道案始末》,《文史资料选编》第39辑,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217—218、215、215、215页。
- ㉑《平白云观惨案,地方法院昨日开审两主犯认罪》,《申报》1946年11月18日。
- ㉒采真《白云观火焚老道案》,《礼拜六》1946年第53期。
- ㉓《白云观道士许信鹤等杀人案起诉书》,《法律知识》1947年第1卷第3期。
- ㉔凌昌炎《白云观道士许信鹤等杀人案辩护意见书》,《法律知识》1947年第1卷第3期。
- ㉕《北平活烧老道案,为首三人坐长监,其余各人分处徒刑》,《申报》1946年12月14日;又见许英华《北京道士火烧白云观安世霖、白全一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165页。
- ㉖《北平火烧老道案主犯三人判五年》,《申报》1947年9月23日。
- ㉗《北京特别市社会局第286号公函》,1940年4月17日,《为白云观已革住持安世霖违抗法令延不离职仍擅自以住持身分在观任意妄为申请迅予重惩办以申功令由》,1941年, J2-8-1342,第109页。
- ㉘一四七信箱《白云观案件一封丘八函》,《一四七画报》,第20页。
- ㉙“今非昔比”,《申报》1946年12月14日。
- ㉚《白云观看顺星》,《华北日报》1947年1月30日。
- ㉛瘦娟《紫罗半奩杂碎》,《申报》1948年8月6日。

(责任编辑: 丁 远)

Monastic Rules for Taoist vs Law: The Further Study of Fire Case of An Shiling the Abbot of White Cloud Taoist Temple in 1946

Fu Haiyan

Abstract: An Shiling the abbot of White Cloud Taoist Temple and Bai Quanyi the Supervisor of White Cloud Taoist Temple were burned by the 36 Taoists of White Cloud Taoist Temple in the name of Monastic Rules for Taoist in November 1946.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is tragedy is a big social news in Peking Taoism history, even in Chinese modern Taoism history. The fact that opponents burned An and Bai in the name of Monastic Rules for Taoist is the result of long conflict among White Cloud Taoist Temple. At first these opponents tried to accuse them by Monastic Rules for Taoist or lawsuit. But they failed, so they choose to kill them by traditional Monastic Rules for Taoist which was abandoned by An Shiling. Some social opinions doubted the existence of the Monastic Rules for Taoist. Defiance counsel emphasized this case is not only a legal issue but also a religious issue. The Peking local court considered they turn themselves in, but still denied its rationality of burning the abbot.

Key words: White Cloud Taoist Temple; monastic rules; law; An Shiling